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政治经济 和苏联社会主义

〔英〕亚历克·诺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政治经济和苏联社会主义

[英] 亚历克·诺夫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室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lec Nov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viet Socialism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79

根据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 1979 年版译出

政治经济和苏联社会主义

〔英〕亚历克·诺夫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室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5,000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4188·32 定价: (七) 1.25 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本书所收录的各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探讨俄国的过去与现在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类问题。这些文章是我在过去十年中陆续写成的。它们的内容竟很少重复，这连我自己都颇感惊异。我在汇集这些文章的过程中，对内容作了些修改，更新了一些统计资料，加进了一些可资相互参照的材料，并提到了自原文写成以来出版的一些有关书籍。但除个别地方之外，这些文章重印时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面目。对于有关方面欣然同意重印这些文章，我十分感谢。

如果这些文章改在现在写的话，写法会不会有所不同呢？当然个别文章会有些不同。我在《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一文中引用了拉柯夫斯基一段很长的话。如果当时我能花些时间读一读拉柯夫斯基的原著的话，我就会把这段引文用到我后来写的《苏联有一个统治阶级吗？》一文中去。《计划制定者的偏爱、优先项目和改革》一文是在苏联宣布进行经济改革之时写的，而这一改革现在已大部遭到挫折，所以这篇文章应该同《经济改革中的政治》一文结合起来阅读。我在写关于布哈林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斯蒂芬·科恩所著的见解精辟的政治传记尚未问世，否则文章的内容肯定会反映出我阅读这本传记的情况的。论述“市场社会主义”的那篇文章肯定也会吸收 W·布鲁斯、拉多斯拉夫·谢卢斯基等人最近写的和后来贝特兰自己写的论著中所阐述的一些重要思想，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基本论点是不会有很大更改的。

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论述了有关“标准”问题。文中提出了，至少可以说包含了我在研究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时所遵循的“哲

学”。我在文中强调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事物的可能性总有一个限度，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十分重要。这种限度确实是存在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攻击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任何教义。一些看起来最合乎需要的行动、制度的安排和政策可能恰恰是不切实际的东西。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拿破仑战争的年代。当时拿破仑在德国进行一场战役，他命令法国军队每开进一个城市，教堂都要响起钟声。有一次他的队伍开进一个城市，却没有听到一声钟响。他把市长召来。“为什么没有钟声？”皇帝大声问道。“陛下，”市长回答，“这有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钟。”“住口，”皇帝大喝一声。我们也应该记住，如果在冷酷的事实面前某件事情根本做不到，我们还在那里侈谈它是否可取（或本来是否可取），那是毫无意义的。另外，还必须看到，正如科拉考斯基最近所指出的那样，某些目标可能证明是不能共存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努力的成果往往与行动者原来的目标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笔者非常清楚，对本书探讨的许多问题，存在着许多正统的看法和相反的见解。展开争论是十分需要的。只有经过争论和辩驳才能对事物有更好的理解——或者我们应该这样希望。但是我们必须避免用巧辩的废话来代替冷静的分析。我们不妨举出下面三种人们可能提出的主张为例：

(1) 1923 年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拥护托洛茨基；

(2) 1923 年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反对托洛茨基；

(3) 1923 年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消极被动，对上面两种主张抱无所谓的态度。

作为学术讨论，上面这三种笼统的提法都是“不合格”的。当然如果提出这些说法的人能够举出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论点，那就另当别论了。不消说，能够为之辩护的论点往往不止一个，而且支持这些论点的某些论据可能会相互矛盾。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拉斯基教授曾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分析问题时要避免使“结论包含在前提之中”。决不能用随便下定义的作法来排除问题。这么说并没有攻击任何“意识形态”之意。因此，我在论述经济思想的那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从有关的现实情况中不合逻辑地概括出一些抽象概念的作法，不但是“资产阶级”主要经济学流派的通病，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①易患的毛病。按照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定义，社会主义可以消除使现在的工业社会困扰不安的一切复杂矛盾。其实，能够完全预见一切的计划制定者和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性的市场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就象洛斯比一直在指出的那样，这完全是因为自由选择本身包括对别人的选择的无知。

当然，批评别人容易，实现自己的学术原则就难了。我只希望，我已实现了自己的学术原则。

最后，我愿向伊丽莎白·亨特的非常宝贵的帮助表示谢意，感谢她协助我把本书整理成了能够“付印”的形式。

^① “原教旨主义者”原指那些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反对较为近代的教义的人。——译者

译 者 的 话

《政治经济和苏联社会主义》是英国著名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历克·诺夫所写的一本论文集。全书共收集了十三篇文章,它从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历史、苏联政治经济思想的演变以及当代苏联和东欧国家存在的一些经济问题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苏联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病。作者结合苏联的实际情况对研究苏联的社会性质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用不少篇幅评述了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人的政治经济思想。显然,书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书中提供的资料和作者的一些分析方法对今天研究苏联的社会性质和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翻译:张多一(第1—2章),海波绿(第3—5章),朱家明(第6—7章),张烈雄(前言、第8—11章),张俊泉(第12—13章);校订:倪孝铨(前言、第1—6章),胡毓鼎(第7—13章);统校:胡毓鼎。

中国社会科学院
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室
1981年9月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俄 国 的 历 史

第一章 历史、等级制度与多民族——对苏联社会结构的若干论述	3
第二章 一个崛起的国家——俄国	35
第三章 关于 1929 年至 1931 年的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	60

第二部分：政 治 经 济

第四章 作为经济学家的列宁	85
第五章 对布哈林及其观点的某些看法	108
第六章 计划制定者的偏爱、优先项目和改革	134
第七章 “市场社会主义”及其批评家们	149
第八章 东欧经济思想的若干发展	175

第三部分：当代的经济问题

第九章 经济改革中的政治	205
第十章 东欧粮食能自给自足吗？	220
第十一章 共产党国家的通货膨胀	237

第四部分：对苏联的研究

第十二章 苏联有一个统治阶级吗？	259
第十三章 关于苏联问题研究标准的若干意见	290
参考书目	317

第 一 部 分

俄 国 的 历 史

第 一 章

历史、等级制度与多民族

——对苏联社会结构的若干论述

以下的一些评论，实质上是一系列(依我看来)同苏联社会结构的起源和性质有关的假设与讨论要点。我并不打算断言下面所谈的任何一个问题就代表了对一种复杂现象的唯一解释。举例来说，从历史上看，俄国的过去显然同它的现在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统治者对与其地位相称的行为举止的思想的形成上，同时也表现在影响被统治者情愿接受在另外一种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他人们可能认为完全无法忍受的东西。另一方面，我清楚地知道，历史传统是一种多方面的事物；随便举出几位无疑构成俄国过去的一部分、同时无疑在许多实质方面又各不相同的人物来说，这种传统包括彼得大帝和沙皇阿列克谢、巴枯宁和波别多诺斯采夫、斯·拉辛和尼康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既然如此，就不去谈有关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今天社会结构中任何组成部分的必然性这类问题了，虽然对其特殊的俄国背景是不能轻易低估的。

让我们从讨论国家同等级之间、为国家服务同地位之间的关系开始。懂得俄国历史常识的人当然都知道，伊凡四世基本上摧毁了旧式世袭贵族以自治领土为基地的势力；沙俄特权贵族家庭的后裔逐渐同由于为皇室服务得到报酬而拥有土地的臣仆阶层(贵族)结合为一体；两种占有土地的形式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正式或非

正式地同为国家和代表国家的君主服务的义务联系在一起。最后，彼得大帝强行规定，所有贵族一律有义务为他服务——我们姑且把“贵族”看作这一时期恰当的用语。（十七世纪，贵族阶层中的许多人仍然是普通士兵和小公务员。）彼得规定了贵族的具体义务，把他们分成十四个文武等级，终身都要为他服务。研究俄国的历史学家们，也同样充分探讨过强调普遍服务和构成其经济基础的农奴制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国土人口稀少，易受外敌侵袭，东部边界开放，经济状况落后，文化和技术水平低下，并因此而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维持国家的生存等等。除此之外，俄国还缺乏自发的社会力量：它有一个传统守旧、未受教育的商人阶级，它严重缺乏受过教育的官员，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文学作品。（直到1800年以前，也就是在涌现出拉辛、高乃依、莫里哀、莎士比亚、弥尔顿以及谢立丹等文学巨匠的时期，除了对研究文物和语言学感兴趣的人之外，能使人阅读时感到愉快或者兴趣的俄文作品实在是寥寥无几，这是很使人惊奇的。）

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其国家或君主能象在俄国那样完全统治社会舞台。当然，类似伊凡打击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事例在别国也有：法国的路易十一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曾采取过与之相似的举动。在法国，贵族也同样被降到了廷臣或者国王的高级文武官员的地位。但是那里对国王完全仰赖的程度要低得多，法国世袭贵族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眼界比起俄国的贵族阶层来要高得多。法国的专制制度容忍了城市和乡村发达得多、自治程度也更高的社会生活，而且它的确是以这种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在德国，早就发展起了各种各样的权力与威望中心，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大大的、小的和极小的统治者，内部的治理方式种类繁多、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如普鲁士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为国家服务和农奴制的基础之上的）。波兰的贵族特别强调自己对（选举产生的）君主的独立性，以致产生过一些对这个国家来说极为不幸的后果。

然而，依我之见，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国家服务的观念可能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多年以后。贵族虽然（在 1761 年）被彼得三世从强制性劳役中解脱出来，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仍继续在军队和文职机构中为沙皇服务。其余那些不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人对社会不起任何作用，成了这一时期俄国小说中占显要地位的所谓“多余的人”。在普希金以及普希金以后的年代里，仍然存在着把服务的俄文词语当作在国家机构供职的同义词的习惯用法。只是在过了很多年以后，为某个私人雇主工作才“适用”这个词义，并由此衍生出“办公室职员”这个现代词语。在法律上把人分成不同等级或阶层的现象一直延续到 1917 年。

用西方熟悉的任何标准来衡量，沙皇及其官吏对贵族绅士日常生活的控制，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也是相当严厉的。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尼古拉一世的宪兵机构头目班肯多夫伯爵，就曾负责圣彼得堡的贵族的行为举动，这同英国的宪兵主任要负责监视管理英国军官的一举一动是一个意思。普希金在他的文集中，曾经提到过一些贵族阶层的年轻人，由于在一家剧院里吵嚷而被逮捕并被放逐出首都。（普希金，第 7 卷，第 42 页，1887 年。）怎能想象 1830 年的伦敦、巴黎或者维也纳会发生这种怪事！普希金甚至在自己已经恢复了政治上的名誉之后，仍不得不就擅自离开莫斯科去乡下一事，向班肯多夫再三致歉；他出国旅行的权利一再遭到剥夺。普希金去世五十年以后，他的一位传记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强调等级在俄国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官阶的最伟大的艺术家，在官场社会中的地位还不如一个最低级职员，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么安排的。”这位传记作者接下去指出，普希金“被赐予宫廷近侍的官衔，以便他那位（美貌）夫人能够应邀出席跳舞会”。（同上书，第 1 卷，第 xvi 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说，世袭继承权本身并不能带来很高的地位和身分。

普希金写过这样一段虚构的对话：一位西班牙人请作者（普

希金)解释他苦思而不得其解的“贵族”一词在俄国的具体情况下到底含有何种意思。他问道:“看起来你们俄国的贵族阶层在社会上是平等的,加入这一等级并不受任何限制。既然如此,那么你们所说的贵族的含义又是根据什么呢?”作者回答说,俄国古代的贵族阶层衰败了,变成了一种第三等级。其中有些自称具有贵族地位的人,是最近才被封为贵族的;不过,“我们并不为祖先的荣耀感到自豪,我们为之骄傲的是某些愚笨的叔伯们保持的官阶”。(同上书,第4卷,第359—360页。)普希金在别的文稿中强调指出,进入贵族阶层“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在军队和国家机构中供职和获得大学学位,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其他阶级的人提升到贵族阶层中去。(同上书,第5卷,第99页。)饶有趣味的是,普希金认为这种情况是值得称许的。他曾写道:

“彼得之后的贵族设想过对专制统治进行限制;然而幸运的是君主们的聪明机智得到了胜利……政体的形式终于未被触动。这使得我们免受可怕的封建主义之害,因而并没有造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把人民和贵族分隔开来……若不是这样的话,(贵族)本来会破坏解放农奴的可能性、限制贵族的人数以及阻止其他等级的成员获得官阶和荣誉。”(同上书,第12页。)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普希金把1761年贵族从强迫劳务中解脱出来视为“不光彩的事”。不过,他也觉得缺乏世袭原则是造成俄国国力衰弱的一项重大原因。他在自己的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作品(用法文)中写道,缺少事实上的世袭贵族,专制者周围就会拥有忠实于他的臣属,一切对抗和公开要求独立就都会遭到压制。上层贵族的世袭制是它独立性的一个保证,相反,非世袭的新贵族就必须用专制的或者暴虐的手段来获得他们的独立性。(同上书,第87页。)普希金在一些十分微妙的有关历史的评论中,在追溯这种

现象时指出，沙俄特权贵族并未转向封建的一方，“他们在君王的宫廷里居住，并不去设防加固自己的领地，没有把自己的生存建立在弱小家族的命运之上，没有同君王打仗，没有向城镇出卖他们的劳务：他们既是廷臣又是朋友，他们结成小宗派，因年资的深浅而定身分的高低”。（同上书，第85—86页。）最后，在小贵族阶层（即非贵族式的贵族阶层）的压力下，沙俄特权贵族和世袭的年长资深者阶层被彼得取消了。

这样看来，虽然贵族阶层的地位也能通过被提升到某个文职或军职的官阶以上而得到，但是不仅这种地位最初属于世袭服务阶级的地位，而且这个阶层的人在其社会生活中还备受监督甚至监护。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出现，由于超出了常规的范畴，一定给当局造成过烦恼和不安。给他们贴上“其他等级”的标签的做法，就反映出官方的困惑。

随着十九世纪年代的进展，阶级和等级上的种种区分差别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因此，在叶卡捷琳娜时期存在于文武职官员与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到了比如说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此时期，政治上颇具影响的官僚阶层已经能够、并且的确持有一种对土地不发生任何兴趣的观点。他们的阶级属性确实使分析家们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带有封建色彩，显然更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难道这些人超脱于所有阶级之上吗？难道他们本身就是一种阶级？

然而，仅仅从贵族自己或君王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贵族及其对国家的作用，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人们对民间对专制制度和贵族的看法也怀有同样的兴趣。以下各点尽管有流于笼统的可能，但看起来的确与我们这个专题有关，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第一，直到二十世纪以前，农民一直承认沙皇统治的合法性，并对沙皇怀有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敬畏。他们举行的许多次起义，

其锋芒都是指向那些据说对沙皇隐瞒真相、为达到自己自私的目的而不惜歪曲沙皇旨意的绅士贵族们的。农民们觉得需要有权威，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混乱和不安定，外国势力就会乘虚而入，掠夺土地和百姓。回想起来，我的父亲曾经告诉过我：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应征入伍的农民们唱过这样的歌：

土耳其苏丹给俄国沙皇写来了信，
他在信中这样说：
我将入侵你们的国土，
我本人也要前来俄国居住。

对贵族获得权力一事，农民中大多数人本能地充满了不信任感。伊凡雷帝虽然只稍稍削弱了贵族（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竟成了民间传颂的英雄。人们认为，把贵族从劳务中解放出来，无异于允许他们变本加厉去虐待农奴；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不过，不论什么时候，沙皇只要愿意，他都可以依靠下面的支持来反对贵族。只有彼得大帝是例外，他向过多的现存的传统挑战，包括宗教传统（东正教的“沙皇”及其他），以致招来了许多农民对他个人极大的敌视。

农民对那些向沙皇和国家负有义务的人负有义务。这一点毕竟是农奴制度最初的基本原理。贵族从劳务义务中摆脱出来以后，农民却仍要继续对贵族尽义务，这就激起了他们深深的怨恨。但是，有义务服从制定的权威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它表现在文艺作品中两段内容非常相似的情节里，一段出自普希金写的《上尉的女儿》，另一段出自托尔斯泰所著《战争与和平》一书。这两部书中都有这样的情节：起义的农民在意志坚强、勇敢无畏的军官面前，不仅屈服顺从，而且把他们自己的领袖绑缚起来送交官府。

由此看来，一个自行其是，不为合法权威效力，相反却向它挑

战的独立自由的“绅士”的概念，是同民间传统的意识背道而驰的。而一个商人就不同了。他有权利，也有义务去做买卖，人们可能会把他看作这一不十分高尚的行当中的一个胆大果断的家伙（许多民歌中的“青年商人”，“勇敢的好人儿”）。而受过教育的人不应当为别人“服务”，则是一种新颖惊人的想法。六十年代中那些命运不济的人们，在其英勇的、然而却徒劳无益的“到人民当中去”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今天，民众的这种态度很可能仍继续存在，因为苏联党内的保守派可以呼吁民众起来反对“不忠实的”文艺界人士，而且整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可以说主要不是以马克思的学说、而是以普遍为国家效力这一旧思想为基础的，根据这种思想，作家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便都不应该被豁免为国家效劳的义务。

为了确保这种效劳，为了卓有成效地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颠覆作斗争，沙皇的官吏们设计出对言论和行动进行控制的做法，这一点又同十九世纪欧洲通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手头保存着一张 1900 年颁发的英国护照（这张护照似乎是索尔兹伯里勋爵亲笔签发的）。那个时期护照还很少有，但俄国就需要护照。护照上面盖满了各种各样的图章戳记，不仅注明了出入帝国的具体地点（上面出境签证齐备），而且还附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有关警察管区的注册登记。毫无疑问，每一个读过马尔基·德居斯蒂内著作新版本的人，都一定熟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规定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规定之间的相似之处。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这种制度只有微小的改变。那个时候俄国人在俄国城市生活就要有居住许可证，实行登记的做法，今天的苏联也仍有这一做法。按照规定，集体农庄庄员要想离开他的村庄，事先必须得到一种许可证；这一做法使西方观察家惊诧之极，它不仅同农奴制度有相类似的地方，而且同 1861 年以后的农民村社拥有管理其成员行动的权力和责任的情形相似。